

史事探微

—— 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李鸿宾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史事探微

——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李鸿宾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事探微：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李鸿宾
编.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2

ISBN 7-5005-6990-4

I. 史… II. 李… III. 中华民族—民族历史—文集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656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cn>

E-mail: cfeph@dre.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中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625 印张 276 000 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

ISBN 7-5005-6990-4/F·611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陈连开先生访谈录	邱永君 (1)
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研究	
——陈连开教授答波兰 S. 辛科维奇问	
.....	雷虹霖 潘守永 (21)
夏商周时期浙江地区土墩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	杨 楠 (31)
西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	陈名杰 (43)
扬雄的“方言地理”区域观	
——《方言》的区域划分及相关问题再辨析 ...	雷虹霖 (65)
南海丝绸之路第一港——徐闻港	申友良 (92)
隋初王朝统辖之下的河北	李鸿宾 (107)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张亚莎 (137)
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的交流	周润年 (160)
试论元朝的“四等人制”	
——兼论元朝政治的若干特征	蔡凤林 (173)
关于《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及相关问题探析	尚衍斌 (189)
关于明洪武时期招抚安置蒙古人的两个问题	奇文瑛 (207)
试论明代播州“杨应龙之变”	方素梅 (220)
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刍议	刘智文 (234)
东干族与回族文化的比较研究	丁 宏 (248)
国民政府的蒙藏政策及管理机构研究	喜饶尼玛 (264)

游牧的尽头	易 华 (280)
试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阶段划分	
——兼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的演变	高翠莲 (301)
量化方法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周方银 (322)
关于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杨刚基 (342)
陈连开教授学术简历	(356)
后 记	(364)

陈连开先生访谈录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陈先生，感谢您能接受采访。今天的话题是否就从您的斋名“三乐居”谈起？

陈连开（以下简称：“陈”）：好。孟子有云：“人生有三乐：无愧于天，无怙于人，一乐也；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此古圣贤之境界，我虽一介凡夫，却心向往之，因此引为斋号。另外，我认为现代人亦有三乐，即“自得其乐”、“各乐所乐”、“助人为乐”，斋号亦寓此意。总而言之，我是乐观主义者。

邸：在当代学者中，您素以学养深厚、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性格豁达而著称。您认为是哪些因素成就了您的这些优点？

陈：过奖。我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而论，皆难领受如此评价，自我审视，“中人”而已。谈到学养，似却有些家学渊源。我于1933年出生于湖南省东部攸县皇图岭乡龙和村圳上的一个耕读之家，年幼时家境小康。族人中世代皆有以开馆（教授私塾）为生者。我曾祖翹轩公终生授徒，成就者多，享寿九十有四，颇有名望于乡里；祖辈、父辈中有些人亦有才学，家中藏书也小有规模，形成了“崇儒重文”之家风。这对我后来走上学者之路具有一定影响。其实，一个人之成长环境不只是家庭环境，周围的社会环境亦十分重要。我的故乡攸县西汉时就已置县，但历史上在文化领域有建树者却鲜有其人。而攸县临近醴陵，就我

家而言，距攸县县城 120 里，距醴陵县城却只有 90 里，反而更近。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属于湘江支流渌水流域，紧邻长沙、湘潭。株洲原属醴陵一个乡镇，因京广、浙赣两条铁路在此交汇，遂成为南北、东西铁路交通枢纽，因此其地位日隆，现已是地级市，醴陵、攸县、茶陵等县皆属株洲市管辖，真乃后来居上者也。

自我稍知世事，第一个向往之地就是醴陵，后终于得以前往，先就读于醴陵湘东中学，后转学于开明中学。是何原因使我离开故乡攸县而去醴陵求学？我家离醴陵较近固然是原因之一，而醴陵经济、文化远比攸县发达，则是吸引我去醴陵求学的主要原因。醴陵设县在东汉，晚于攸县，但与长沙、湘潭接壤，又地处交通干线，历史上就文风颇盛，人才辈出，留下了不少人文名胜；经济也较发达，长于制瓷，与景德镇同获“瓷都”美誉；又盛产烟花鞭炮，其种类、质量足可与浏阳花炮媲美，因而与之同列为驰名中外的“花炮之乡”。自晚清以来，湘军、湘学颇令国人瞩目，而醴陵在这两大突兴湘流中，贡献多多；并涌现出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杰出人物。尤其于军政界更加突出，从国民党时期的程潜、陈明仁等到中共杰出领导人李立三、抗日名将左权及耿飚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将领和仁人志士皆出于此，使醴陵成为先进人物之摇篮。这就是其对少年之我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之所在。

至于我的家族，在太平天国兴起前，大概是当地巨族。太平天国来到我的家乡，不仅焚毁宅院并将我尚在青年时的曾祖父当人质押至天京（今南京），并索要巨额赎金。后虽因有李姓千夫长解救，并亲自护送回湘，但从此家道中落。为谋生计，我曾祖父始以开馆授徒为业。至我祖父时，虽一度中兴，而较之鼎盛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邸：就我观察，是否重视对子弟之培养及能否成功，当地向

学风气与家学传统所起作用似乎比家境之贫富更大，所谓“孟母三迁”之典即可说明此理。

陈：言之有理。至我出生时，家境每况愈下，然受民风家风影响，我仍得以五岁入私塾，故而发蒙较早。塾师陈经策乃我堂伯，此人思想保守，性情孤僻，但国学功底深厚，小有名气于乡里。这样，我在家塾中读书计四年余，学习内容多为《四书》、《五经》及《左传》等古籍，因而为日后走上学术之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我赴醴陵读初中，假期回乡后，仍从经策师读古文，因而少有闲暇。经策师对学生之书法亦十分重视，认为“字如其人”，“不能书，则难成大事也”。但我本人却不愿练字，每每偷闲搪塞，终致满纸“涂鸦”，想来追悔莫及也。

邸：先生不必过谦，我见过您的墨迹，虽不能称为上乘之作，但笔力遒劲，字有法度，胜眼下不少偏好题字之“名流”、“雅士”者多矣。此辈以“墨猪”、“涂鸦”之丑书陋字，却敢高悬于堂皇之处，令见者不忍足睹，已成污染之公害，诚可谓少廉寡耻之世风使其然也。

陈：文天祥有诗云：“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我的少年时代正值多事之秋，山河破碎。但当时学界风气却胜当今者多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刻苦自励，情绪激昂。1944年，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役，三湘大地战火纷飞，狼烟四起。我正读高小，师生颠沛流离，一日数惊。但即使如此，仍努力学习，不使学业荒废。当时我们的教师不少是失学的大学生，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者乃国文教员贺铁成。他经常在课堂上慷慨陈辞，历数日寇暴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从那时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感便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灵之中，并在我日后研究的“中华民族形成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到湘东中学就读后，我积极参与学生政治运动，但该校管理极严，我深感压抑，便转学至开明中学。该校气氛活跃，我如鱼得水，与诸同学成立社团，名“雁群社”，并有进步教师欧阳文道、文家驹等担任指导。后来才知道，这些教师均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对我们进行思想诱导，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赞不绝口，我们被其描述所吸引，幻想有朝一日祖国亦能像苏联一样强大，人民能像俄人一样幸福。此时已进入解放战争中后期，国内形势变化万端，但“求变迎新”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真心期待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1949年5—6月间，我与另外一名同学（亦是族兄弟）曾经密谋策划离家出走，去寻找苏联——我们心目中的天堂。但我们竟不知其在何处，只知道在遥远的北方。结果我因故未成行，而他却义无反顾，独自向北“挺进”。从此杳如黄鹤，音信皆无。但前两年他突然由台湾回乡探亲，才知道他当年只北行百余里，便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挑夫，并一直挑到了台湾！此事一方面说明当时青少年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迫切；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幼稚与天真。不久，陈明仁发动起义，湖南即告解放，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邸：算来当时您是16岁的少年，想必您亦与同时代所有青少年一样，曾心潮澎湃，彻夜难眠？

陈：的确如此。沐浴着新中国的曙光，真是思绪万千，摩拳擦掌。我当时只差一个学期便初中毕业，但已无心再学，便毅然决定辍学回乡参与迎接解放、建立政权和社会改革等一系列活动。我上小学时的老师贺铁成此时担任了区长，但我并未去找他，而是在本村帮助工作组工作。与当时周围同志相比，我已是文化程度相当高的“知识分子”。加之“初生牛犊不畏虎”，我的积极最初得到工作组的欢迎和重视，连本村由龙家台改为“龙和”，村名也是我所起。但好景不长，土改摸底，我家被划成地

主，我在本乡参加工作已不可能。工作组领导肯定了我的积极性，开介绍信要我报考四十六军军政干部学校，政审和文化考试都通过，而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这样我不得不回家务农。

值此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另谋出路的关键时刻，醴陵开明中学更名为醴陵二中，由文家驹老师出任校长。他想起了解放前夕有我这样一个个头很小，但非常活跃的学生，便捎信邀我回校复学，给予甲等助学金，并免交食宿费。于是我又回到学校，得以完成初中学业。师恩难忘，可惜文家驹老师今已作古，而我复学时的班主任文家彦老师虽已离休，但至今仍保持联系。其实，这也是共产党对我最实际的关怀，令我终身难忘。

邸：是何原因使您走上学术之路，并从事历史研究？

陈：我的学术之路十分曲折。初中毕业时，学校欲保送我入湘潭卫生学校，但自忖不适合亦不爱好从医，便婉言谢绝。到1952年初，我在长沙先后投考湖南银行学校、湖南工业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有幸被3所学校同时录取。就当时而言，我最喜化学，应选工业学校。但当时该校须缴纳学费，我虽拥有“地主”成分，但“土改”后已变得一贫如洗。而第一师范可免交学费，又是毛主席的母校，于是便选择了湖南一师。当时我已19岁矣。

一师学制为3年。其间我曾对文学产生过兴趣，并在文学刊物《处女地》上发表过小说《死在黎明之前》，叙述了一位学生地下党员，在解放前积极组织学运，不幸英勇牺牲的故事。人物情节虽是虚构，但也有一定依据。1955年，我在一师毕业，恰逢刚刚成立于湖北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到我校招收教师，因我成绩优异而小有名气，有幸被选中去大学当教员（当时一师毕业生多为中小学教员）。到任后，我却发现，学生尤其是调干生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学员需补习中学课程，名曰“预科班”。

我被分配到“预科班”讲授文学。通过接触，时任副院长的岑家梧教授对我赏识有加，并选调我做其助手。岑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讲授《原始社会史》，我边听课边做助教，渐渐激发了我对史学的兴趣。1956年，学校要开设民族学课程，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大前身）历史系正举办“民族学研究班”，岑先生便推荐我到北京进修学习，准备学成后回武汉讲授民族学。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晋京，并且是以中南民院带职研究生的身份晋京，内心的幸运感和兴奋劲，真是难以形容。

来到历史系以后，我首先认真全面地了解了民族学研究班和本科的课程及任课老师的情况。民族学研究班，只有苏联通讯院士切博萨罗夫教授主讲民族学课程，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名教授都不参与授课，林耀华教授虽是历史系副主任，当时也不担任民族学研究班的课程。而民族史专业则是另一番光景。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著名元史、蒙古史专家翁独健作出规定：没有副教授职称不能上基础课，甚至不让登讲台。著名辽金史专家傅乐焕时任系副主任，清史专家王钟翰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明史也有胡德煌、孙钺教授主讲。可以说辽金元明清史都有名家担纲，是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史专业的突出特点。此外，张锡彤教授主持世界史教研室，徐宗元教授的先秦史研究也很深入。他们不仅学问扎实，而且极负责任。本系教员已名家云集，还特别聘请夏鼐、苏秉琦领衔主讲考古学课程，贾兰坡、吴汝康领衔主讲古人类学课程。这样的课程设置和名师讲授，所具之吸引力实无法抗拒也。

我当时已23岁，而且在中南民院已挂名当岑家梧教授“助教”一年，比一般十七八岁考入大学的同学更重视课程之设置与老师之选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做出决定：降到本科求学，并选择历史专业。这将给我带来许多变化。第一，中南民族

学院将不再承认我“带职派往中央民族学院进修教师”之身份，要与中南民族学院脱离关系，另谋衣食之源；第二，中央民族学院虽同意对我放宽条件，允许我参加入学考试，但必须符合录取标准，这就意味着万一考不中，则丧失了求学机会；第三，即使考取，读5年毕业也只是大学本科，而研究班虽然学制3年，但毕业则享受研究生待遇。我当时已23岁，在研究班里年龄适中，而降至本科，就比一般由中学考入的同学要大四五岁，毕业时将达28岁，真乃“老童生”是也。就待遇而言，研究生毕业月薪62元，本科毕业46元，这些问题让我考虑再三，但还是决定去中南民院要求辞职，投考中央民族学院本科！当时不少人以为我既疯且傻，但我却又义无反顾。

自大学三年级起，我便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主要是在青海藏族牧区，到毕业时，前后达3年之久。此间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秋至1959年国庆10周年以前，下部落作实地考察；1960—1961年8月回校以前，除了整理调查报告，还花了很大精力参加青海省志的创始阶段工作。

下部落调查收获很大。我先后到过海南、玉树、果洛三个州，下至部落考察青海湖南岸地区、黄河源地区（果洛州）、长江源地区（玉树）藏族游牧封建社会及其历史。1961年回京之前，又到海西州牧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做了补充调查。这些调查的收获，可以说使我受益终生。第一，当时我已初步认识到，中国农牧区划分乃天然形成，非人力所能改变。中国农牧两类民族的矛盾和相互依存，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关系运动发展的基本形式。这些认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始终产生着影响。第二，我在当时已深切体会到，部落牧场虽表面上“公有”，实际上千百年都是部落的封建领主之领地，牧民是其属民，是依附牧民，相当于农区的农奴。牧区的牧工有雇佣的外表，实际上是一

种封建工役。因此，牧区的民主改革，主要应是废除领主封建特权，实现牧民人身解放和对牧场的民主管理。1959年，我曾以调查组名义撰写文章一篇，名《民主改革前青海藏族牧区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民族研究》（1960年第2期）。第三，我当时已深感到牧区开荒，是对天然形成农牧区的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认为牧区必须以牧为主，以发展畜牧业为中心；牧区可以逐渐发展饲料基地，变游牧为定居牧养，但决不能以发展农业为目标；牧区不能成为粮食基地，但可以建设成肉食与毛皮原料基地。青海牧区调查组的同事，多数都与我持相同看法。但这些看法与当时政策相左。青海省有些领导也支持我们的看法，鼓励我们书写内部讨论稿报送当时的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所以，我除了上述用青海调查组名义发表在《民族研究》的论文外，还写了“内参”稿，调查组组长陈永龄先生支持我以及其他几位大胆的调查组成员提出自己的看法。

1961年，我毕业留校工作。大概是1962年秋，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汇报与讨论会，关于游牧区封建制度和牧区经营方针是中心课题之一，我被指定为汇报人之一。领导同志和著名学者李维汉、刘春、范文澜、吕振羽、翁独健等参加会议。会开了3天，会后约我写了一组文章，在《民族团结》学术栏发表（当时《民族研究》因故暂停刊）。叮嘱我必须肯定“三面红旗”，但对讨论的问题可大胆发表学术见解。结果我在1963—1964年发表了《青海藏族牧区游牧封建制度的基础与特点》、《论青海牧区的工役制度》和《牧区必须以发展畜牧业为中心》等3篇论文。这是我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署名“之明”。这个笔名最初是我在1948—1949年用的，意思是“走向光明”；在此时，也寓有“自知之明”之意。

在青海调查组的第二阶段，除整理调查报告之外，更主要的

精力多放在青海省委委托的省志之编写。1959年国庆之后，青海省委书记处派员来调查组，说青海计划编写省志，要调查组派人向省委书记处汇报，拟定议题为：何谓省志？解放后哪些省已新编省志？传统省志与新编省志体例有何不同？各有何特点？青海过去编撰过哪些地方志？青海如果新编省志应当采用何种体例？据说，在此以前，省委书记处已向某高校某教授咨询过上述问题，但老先生是一位社会学家，于历史学和地方志学不甚了解，故而不肯随便回答。陈永龄教授找到我，要我准备向省委书记处报告。因为青海省当时称调查组为“中央调查组”，认为应该可以回答上述问题。我经过一番准备，向书记处汇报了传统的省志体例、解放后湖南和山东新编省志、总体例及已出版一卷的情况，较详细介绍了《西宁府志》及《甘肃通志》涉及青海的内容，并提出了新编青海省志应建立编委会，以及有关大致内容和体例之设想。省委书记处参加的成员有：省长、省委书记张国声，副省长朱侠夫、高克亨，省委常委公安厅长薛克明、常委宣传部长薛宏福、常委统战部长冀春光等；还有省档案局局长等列席。调查组长陈永龄教授参加。

出乎我意料之外，听汇报的各位省领导纷纷表示嘉许，决定委托调查组起草关于编撰青海省志的初步设想，供省委作决定时参考。所以陈永龄教授与我又第二次出席省委书记处办公会，汇报起草的设想初稿。出席会的除上次的各位领导以外，还增加了一些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不久，我们整个调查组搬进了刚刚竣工尚未分配的厅局长宿舍，做青海省志初始阶段的工作。我在历史组，负责编写《青海历史纪要》，于是撰就初稿，回京前移交给青海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白砥民先生和省文史馆蔡端先生。蔡先生为名将蔡锷之子。

在上述两次向省领导报告关于省志问题的会上还有一段趣

事。这两次我都在张国声和朱侠夫两位领导下席，朱副省长介绍说他在延安时在民族研究所工作过，贾拓夫是所长，乌兰夫在延安民族学院当领导，还认识我院宗群等。会后，张国声省长问我在中央民院教什么，我说是快毕业的学生。他十分惊讶，说：“我们问过教授，没有回答出我们的问题，对你的回答我们很满意！”并要我毕业后留青海工作，到省委做秘书。我回答说，我不是党员，且家庭出身不好，不合适。他很客气地说了一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我们青海是尊重知识分子的！”这时我已27岁，相当清楚我只能搞学术，不宜搞行政，不仅出身是障碍，而且我的秉性也不宜。现在看来这里我又一次作了明智的选择。

邸：学者之路的确是人间正道，而有所得必有所失。您选择历史专业的代价似乎大了些，当今之人断不会做此“傻事”。我在北大读研时，历史系被诮称为“屎坑”，将考入历史系描述为“跌入屎坑”，实令我等坑中之人哭笑不得。而您却付出如此代价，真“此一时，彼一时”也。

陈：屈原有云：“虽九死犹未悔。”做事不能患得患失，不然将一事无成。我现在回忆起当时的选择，仍有庆幸之感。历史学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的本土学问，具有悠久的渊源、浩瀚的史籍、丰富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徜徉其间，始终伴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精神享受。这可能与 I 年幼时所受教育背景有关。

邸：闻此言，我深受鼓舞。历史学属“国学”，神游其中，其意境诚不屑与外人道也。众所周知，您与费孝通先生共同创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理论，我对此理论深表认同，并用之指导自己研究工作，解释历史现象，有茅塞顿开、屡试不爽之感。您能否谈谈您构思此理论框价之缘起及经过？

陈：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费孝通教授提出来的。他对中华民族的结构已思考多年。

我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思考研究，则是 1969 年受到周恩来总理一个批示的启发开始的。在此以前，我虽对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关系有所思考，也可以说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没有去深入思考关于中国民族及民族关系总体结构的问题。

1969 年 6 月 13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政府声明》，为予以回击，外交部来我院组织中苏边界问题资料组。大家都知道，在“文革”以前，我院一些老专家曾参加关于中缅、中印等边界问题的研究，这些老先生们皆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包袱，于是我被指定为中苏边界资料组负责人。外交部联系人王苓卿同志（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组副组长，后曾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苏联解体后又出任驻俄大使）第一次与我见面时，传达了总理的批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俄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这两个多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发生了边界问题？给现在中苏边界遗留了哪些问题？请组织一些专家研究一下。”（口头传达，未经与文件核对）

在中苏边界资料研究开始之后不久，又传达中央指示，恢复改编“杨图”的工作。这是毛主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议要搞的一项重大的历史地理工程。

毛主席好读史，涉及历代地理时，多用清末学者杨守敬主编的《历代舆地图》作工具书。此图集为线装，共 34 册，用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学方法编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主席提议，聘请专家用现代地图学方法改编杨氏所编地图，所以此项工程最初称之为“杨图改编”。从 50 年代提出，至 60 年代分别由几所高校分工按地区编绘，然后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主持总绘成册，过程漫长，全过程组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局负

责，此处不多叙。

在分工过程中，中央民院历史系由傅乐焕教授领衔组成编绘组，研究和编绘东北地区各图幅。此项工作在“文革”开始时已有了较好的基础，至1970年春恢复工作时，傅先生已不幸去世，军宣队成员黄寿年来组宣布由我担任中苏边界资料组和地图组组长，开展两项研究工作。在进行过程中，各校地图组负责人集中到复旦大学，先后开协作会议数次。大家都认为，此项工作已经不是“杨图改编”，而是重新研究和编绘以历代政区为主体内容的历史地图，遂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幸毛主席逝世以前，已出版内刊本。颇以为憾者，乃毛主席本人对此图集作何评论，至今未传出可靠信息。

在中苏边界资料的整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中，我进一步思考周总理提出的问题，希望能回答“中国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民族如何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问题。历史上中国的农牧民族中，农业民族有华夏汉民族，还有南方众多的水田农耕民族和山耕民族，这些农牧民族及南北农耕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中国之形成和发展有何种影响？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从1969年起，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思考。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之《清图》草图完成以后，周总理批示请“中央文革”和郭沫若先生审阅。主持其事者委托中央民院和中科院（当时尚未成立社科院）民研所的相关同志去请郭老审阅，于是林家有和我们几位到郭府请教郭老。在谈完地图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与田继周等便抓住机会就“如何从总体上评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问题”向郭老请教。郭老在当时万马齐喑、一般人不敢随便向他人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略加思考，脱口讲出“北